

在学生和学校之间,必有一方的利益可能受到影响,有一方会觉得相对不公平:原来的政策保护了学校的利益,学校通过设置条条框框将优秀生源留在本校,这对于学生相对不公平;新的政策保护的是学生的利益,学生获得了选择推免学校、学位的自主权,这对于学校而言相对不公平。但是就教育发展规律而言,只要学生发展得更好,就是更大的公平。

# 推免新政动了谁的奶酪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影视作品中,人们经常看见这样一幕:一群人各自忙碌着,突然间有人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所有人都停下了手边的工作,震惊几秒钟之后,这群人又重新开始了忙碌。

这样的情形,用来形容推免生新政策颁布前后,保研学生的反应再合适不过了。

日前,教育部下达通知,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名额不再区分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不再设置留校限额。此外,推荐高校也不得对本校推免名额限制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报考类型,不得自行设置留校限额或名额。

还有一个多月就到了推免生截止报名的时间了,原本认为没有保送外校希望、一直在为保送本校作准备的大学生突然间看到了曙光。可随之而来的是新的纠结,“万一学校钻政策的空子,不放人怎么办?”“万一没有一所外校录取自己,又该怎么办?”……

究竟新政策的出台应该如何看待?存在哪些利好与隐患?《中国科学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高等教育专家、推免生。

## 谁是失意者

“看到新政策,我的第一反应是‘太棒了,我也有保外的资格了。’”上海某“211工程”大学推免生黄丽说。

她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会计学专业,每年有10个左右的保研名额,只有3个保外名额,通常大家争得“焦头烂额”,“一般情况下保研大多是保送本校”。然而,在高校林立的上海,成绩在年级前10名的学生大可以考到更好的“985工程”大学,因此,更多的时候“保内”在黄丽及同学眼中成了“鸡肋”。

与之相反,记者询问北京某“985工程”大学推免生张桦对新政策的看法,她的回答却很平静,“我所在的中文系在全国排名靠前,新政策对我保研影响不大,无论学校是否设置留校限额,我都打算留在本校继续深造”。但她估计,往年大约80%有保研资格的学生愿意留在本校,“今年这个数字可能会有所下降”。

那么,是否能由此得出结论——新政策对“211工程”及以下的院校、学生更实惠,对“985工程”院校、学生影响不大呢?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认为,这项把权利交还给学生的新政策,对于学生而言,毫无疑问是利好消息。“过去学生想去外校读研,受限于各大学制定的政策,想尽办法托人情、走关系还不一定能实现;如今学生不需要花时间、精力‘走后门’,就可以自由地在学术型与专业型学位之间、在本校与外校中选择。”

而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这项政策对地方院校及学生并不乐观。他解释,对于地方院校而言,首先是难以留住优秀生源——过去由于学校政策勉强留住优质生源的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情况,如今将被打破;其次,把本校学生推向更高层次的院校难度更大了——一些高水平学校由于选择余地更大了,未必愿意继续接收地方院校的学生;再者,地方院校也更难接收水平更高或相当的学校的推免生——过去“定向”保送过来一批外校学生,如今这些学生有政策的保障,完全可以继续在本校读研。

## “流于形式”的背后

新政策出台在保研学生的论坛、贴吧里新鲜了几日后,一个话题在保研学生的圈子里炸开了锅,那就是新政策是否会流于形式?

事实上,2013年教育部出台的推免生政策中,就有规定“所有推免生名额均可用于向其他招生单位推荐”,“不得以任何形式限制本校推免生报考其他研究生招生单位”,但执行到最后绝大多数院校仍然对“保内名额”“保外名额”作了区分,甚至一些院校以“保内”作为学生取得保研资格的条件。

新政策是否会继续流于形式,这也是黄丽的一重担心。而今年的新政策规定推免生通过“推免服务系统”报名,最终推免生名单以“推免服务系统”备案信息为准,未经推荐高校公示及“推免服务系统”备案的推免生无效,也给了她一丝信心,“如果学校强行留人,我们就拿政策去告发”。

那么,究竟新政策的出台会产生哪些新问题?流于形式是否会威胁到学生的利益?

储朝晖表示,政策的出台是利益博弈的结果,新政策的调整更多地照顾了高端学校的利

益,挤压了普通院校的利益,是否会出现反弹,现在还不好预测。“这一政策容易造成不同院校之间的隔阂加深,导致学校之间的级差更加明显,进而产生一些新问题。”

储朝晖提醒,相比较而言,新政策更易遭到地方院校的抵制。有两种情况值得人们警惕:一是过去一些地方院校有稳定的学生输送渠道,如今受限于政策,使得一些地方院校不得不通过灰色运作让学生入读高端院校;二是学校之间“互换”学生的“契约”被打破,彼此都不再愿意接收对方的学生,让推免变成了小圈子运作。

“每个学校、学生内心都有一杆秤。如果流于形式更符合学术内在规律,就让它流于形式;如果流于形式违背了学术规律,必须得想办法让其落实。”储朝晖如是说。

## 专硕成了行政任务

有关数据显示,自2011年来,北京、上海两地的专业硕士推免生人数,除了个别年份之外,已呈现出递减的态势。而这又与教育部预期的2015年专业硕士占研究生总数50%的趋势不相吻合。新政策规定不再区分学术型、专业型硕士,意欲何为?

别敦荣表示,专业硕士推免是近两年新出来的政策,推免人数少之又少。过去优秀学生没有选择专业硕士的推免权利,多数人认为只有考分较高的学生才会选择专业硕士,如今把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放在一个推免平台,表明了二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从这一点来说政策具有一定

的进步性。

然而,学生有权利选择专业学位,与值不值得选择专业学位,并不能画等号。

储朝晖表示,专业学位开办的先决条件是有相应的师资、设备、技术,且与产业密切相关。但是,我国高校在行政管理体系下长期与产业疏远,可谓“先天不足”。

进入统一的系统,不区分学术型、专业型硕士,就像是用一块盖头把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蒙起来,学生事先并不知道会分给自己什么学位,最后揭示谜底的是学校。

“如果学校说没有学术学位,只有专业学位了,让我进入专业学位,我可能会放弃。”张桦对记者说。但是,黄丽却认为,如果能进“985工程”大学,即便是专业硕士,自己也会考虑。

“由于信息不对称,学校的控制权没有真正削弱,反而在专业硕士的推免上更大了。而学校的控制权实际上就是教育部落实增加专业学位的控制权。”储朝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所在,“用行政强制的方式发展专业硕士,而不是市场与高校双方自主结合的方式,并不是长久之计,也不可能真正吸引到优秀的学生。”

## 公平与科学如何看待

众所周知,与本科生培养阶段所追求的公平有所不同,研究生培养阶段更注重的是效率。然而,每有政策出台,公平与效率又必然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别敦荣表示,在学生和学校之间,必有一方的利益可能受到影响,有一方会觉得相对不公平:原来的政策保护了学校的利益,学校通过设置条条框框将优秀生源留在本校,这对于学生相对不公平;新的政策保护的是学生的利益,学生获得了选择推免学校、学位的自主权,这对于学校而言相对不公平。“但是就教育发展规律而言,只要学生发展得更好,就是更大的公平。当学生能选择自己的教育,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去发展,这就为他自身发展奠定了更好的基础。”

如何确保推免生享受到新政策的红利?在他看来,关键在于教育部建立的相关工作机制。虽说教育部推出推免服务系统,让学生、学校在平台上选择与接收,但是怎么确保平台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才是规避过去“暗箱操作”的关键。“怎么操作,何时开放、关闭,对学生、学校的要求……这些信息至少要对学生、招考学校、生源学校公开透明。此外,还应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对于不执行新政策的学校或个人,应当进行问责。”

储朝晖则认为,从长远来看,保证推免生制度的科学发展,还应该尽可能减少行政干预。在他看来,交流本身是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去其他学校拓展视野是提升学术水平的一种重要途径。“要警惕无限限制留校限额出现的高水平大学学生集中报考本校的现象,让大学有更大的自主权,让专业权力发挥更大的空间。”

## 中国大学评论

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一名教授涉嫌猥亵诱奸女生的事件,被媒体冠以“诱奸门”,个别报道以“狗仔队”的方式,将举报者的信息也公布出来,仿佛这样就可以吸引更多的眼球。孰不知如此一来,不仅让举报者本来就受到伤害的心灵再次受到伤害,而且很可能让事件中真正应该受到惩罚和道德谴责的当事人将道德罪恶感部分地转嫁到受害者的身上。

# 大学需要改变管理思维

■尤小立

在涉及法律和道德问题时,揣测动机是毫无意义的。事实就是事实,大家如果把关注的目标都放在事实之上,就完全没有那么多不必要的纠葛。但这可能只存在于理想之中或理论层面,在现实中,人们似乎更容易偏向于了解动机抑或隐私的部分。

在本次有关厦大“诱奸门”的媒体狂欢中也不例外。最初的举报者“汀洋”的身份被披露后,另一位举报者“青春大篷车”信息的披露,恐怕也是指日可待的了。涉嫌猥亵诱奸的一方有“特聘教授”的身份,在此事件中天然地具备着优势,所以很自然地,人们会推测或想象举报者的动机可能不纯,但很少人去考虑,一名有正当职业的年轻女性以自己的隐私作为举报的内容和证据,她本人可能付出的代价有多大?

以动机论得出结论,最现成的例子,就是号称120名厦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往届和在读生联名支持和声援被举报教授的公开信的出现。不要说这些学生“年轻,不懂事”,其实恰恰是他们太过“懂事”,所以才会有此不问是非,只讲关系(利益)的行为。

与学生的高调相比,教师在此问题上低调的原因则比较复杂。这其中很大的成分当然是事不关己,且也不了解具体情况,因而也不便于随意发言。但还有一个因素也正在变得重要起来,这就是“利益攸关”。笔者做了十几年“建立学术共同体”的梦了,但现在看来,学术共同体至今没有形成不说,“利益共同体”的规模却在高等院校变得越来越大。当教师与教师之间成为利益攸关的同盟时,相互辩解、卫护或者选择沉默就是必然的。

可以想见,国内的考古学界,特别是水下考古界的学者不可能出面评论厦大“诱奸门”的,据说,举报者之一的“汀洋”如今也已在考古界以外谋生了。同行之间碍于面子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如果过多地议论,很可能得罪同行,像诸如课题评审、奖项评审,甚至论文发表都可能受到影响,而这一切又与自身的职称晋升、职务升迁,以至人生前途相关(好在与分房、孩子上学关系不大了),因此,与其徒有正直,不如适应社会,这是如今无奈又具体的“现实主义生存经”。

这里深层的原因不能不说是科研管理体制、机制以及相关的管理理念滞后引起的。这个体制、机制和管理理念在过去的二三十年起作用,是因为它在短期内将学者数十年积累的学术热情和学术功力发挥了出来,但现在再看,其弊端却日益凸显。因为越来越趋于集中,“计划性”的成分越来越多的科研管理方式并不能解决积累耗尽、后劲明显不足的问题。而从常识上说,没有个性就没有想象力产生的土壤,没有个性就不可能产生独特创新的可能。

现在看来,“集中”与“计划”更偏向于让少数人受益,经费是少数人支配的,舞台也自然是少数人的,多数人只能成为科研工作的旁观者或看客。于是,孤独的表演者永远在舞台中心的一束灯光里表演着折子戏,永远觉得自己最适合表演,永远自我感觉良好,而大多数的看客很可能从此把看戏或者模仿当成了职业。

科研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的地方,在于“一夫当关”,不存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问题,因此厦大有人担心涉嫌猥亵诱奸女生的“特聘教授”一倒,从此这个学科的优势便不复存在。可见,问题在于产生这个“诸葛亮”的机制太过单一。因为依照这个机制,往往只有一个“诸葛亮”出现,而不是几个或者一批,况且在许多时候,这个独一无二的“诸葛亮”还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回到厦门大学教授“诱奸门”上。既然在此时,学生的唐突和教师的沉默都给学校的名声带来了负面影响,或者这样说,在教师与学生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大学管理者的作为与否就是关键。

大学管理最应该克服的是一颗老鼠屎坏一锅汤的思维。因为一位教授出了事,不等于其他教授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里还是要遵循法律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像现在这样,习惯性地“捂盖子”,看上去是保护教师,实际上更容易让人产生对学校以及所有教师的怀疑,倒不如客观地说明情况,公布调查程序,最终公开调查结果。看来,大学管理者需要学习现代文明的地方还很多。

## 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源头活水

# 中国科大先研院打造“创新丛林”

■本报通讯员 蒋家平

2012年7月28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先研院”)正式开工建设。刘延东同志发来贺信,指出先研院“是有效整合创新资源,建立健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协调发展机制的有益探索”。

经过短短两年建设,先研院园区全面开放使用,已经成为最大化释放创新联合体活力的协同创新平台。与传统的科技园、高新区不同的是,中国科大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着重打造连接上下游的“创新丛林”,以期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提供取之不竭的源头活水,其创新理念和生动实践值得关注。

## 聚焦重点领域“种大树”

近年来,高新区、科技园等各类产业园区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然而,其中多数园区存在着“产业定位不清”“产业链多而短”“产业关联度不高”等问题,难以形成强大的产业链,更难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经济转型的前提是产业转型,而实现产业转型的根本在于‘上游转型’,也就是通过原始创新产生变革性技术,再通过培育新兴战略性产业,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就是常说的‘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上游转型了,产业转型也就顺理成章了。”中国科大校长侯建国说。

为此,中国科大先研院按照“顶天、立地、聚焦”的原则,顺应未来科技革命的大趋势,服务国家和区域社会经济战略需求,结合自身研究领域和优势,将微电子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医疗健康和量子信息等五个领域确定为重点发展方向,并在这五大领域里“种大树”,以抢占下一代先进技术的制高点,从而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快速发展的前沿基础性研究有可能带来两个重大的变革性技术——完全保密的量子通讯和数据处理能力巨大的量子计算机。目前,量子通信“京沪干线”技术验证与应用示范工程已经被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中国科大作为项目法人单位,已在先研院启动量子通信“京沪干线”建设,至2014年7月,运营中心联调测试平台建设方案、用地已经确定。

“争取五到十年内在国际上率先实现广域量子通信,为量子通信应用和国家信息技术水平的跨越式提升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和产业支撑。”量子通信研发团队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说。与此同时,中国科大及相关单位积极开展未来网络关键技术研究,5月17日已成功开通“未来网络合肥先导试验网”,核心网络节点和网络管理中心均建在先研院,已实现与北京等其他主干节点的互联互通,合肥地区的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已汇入未来网络基础设施,为开展大规模网络实验提供了良好支撑。

“当前的网络只是实现了数据通道的功能,但对于‘运送’的是什么并不清楚,不利于优化网络环境。”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大教授徐元元表示,“未来网络”是一种把网络计算、网络存储和网络通信集成的新型网络,具有应用驱动特性,使网络能够智能调配各种资源为用户服务,最终实现“一切在网上完成”的目标。

此外,先研院还在大力组建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区域级“先进技术与产业金融服务支撑平台”、微电子产业共性平台等一批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平台。

## 对接优质资源“建森林”

“增强持续创新能力,为企业发展提供源头活水,关键在于搭建高水平研发平台,在园区层

面打造创新‘发动机’,从而实现要素组合优化和产业深化。”先研院常务副院长陆守香介绍说,基于这一理念,与一般园区侧重于抓市场和生产不同的是,中国科大先研院主张“两头在外,一头在内”,即先研院主要抓研发这一头,和研究所、高校、高科技企业组建各类联合研发平台。

为此,先研院提出“四个对接”,即对接中科院各研究所、对接中国科大海内外校友、对接国际优质科教资源、对接区域发展战略,让国内外优质科教资源在先研院这个平台上实现互动与合作。

一年来,先研院已与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计算技术研究所、电子学研究所及英特尔、微软、阿里巴巴等国际知名企业等共建了国家专用集成电路设计工程中心合肥分中心等30家联合创新中心。同时通过校企、校所和校友的“三校”合作,已培育、遴选先进技术项目162个,先后成立了54家科技创新企业,引进注册资金2.18亿元。先研院标志性建筑综合楼“未来中心”启用后,已经论证入驻的创新单元14家。

“一两个研发平台能发挥的作用很有限,但20个、50个研发平台放在一起,就会形成集聚效应,从量变到质变,从而形成格局多样、来源丰富、各具特色的技术创新丛林。”陆守香说,就像中央银行行为下属银行机构搭建后方基地、裁配中心一样,这样的“创新丛林”为所有入驻创新单元提供了一个健康的创新生态环境,很容易形成创新单元之间的交流、互动与合作,从而为高科技企业的集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技术动力。

记者了解到,先研院积极利用各方优质科教资源,主动挖掘技术创新点,目前已孵化创新企业54家,主要从事电子信息、云存储和服务、大数据挖掘等,开发了近40项新产品,新增销售收

入过亿,争取国家、省、市项目49项,先研院已逐步发展形成格局多样、来源丰富、各具特色的技术创新丛林。

## 立足国际平台“聚人才”

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说到底要靠人才支撑。为此,与众多园区不同的是,中国科大先研院还致力于营造和谐环境,实施国际合作的开放战略,从国际平台上吸引高素质人才聚集先研院。

“我们所谓的高素质人才是指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具体来讲有两个标志,一是有完整的海外留学经历,拿到博士学位;二是有完整的海外工作经历,在国内外科研机构 and 大学工作过,而非仅仅读个学位或者做个访问学者。”陆守香说。

截至目前,先研院已引进信息、材料、工程等领域的科研领军人物和研发骨干40余人,其中中国“千人计划”等高端人才近10人,包括英国伯明翰大学教授姚新、微软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邓力、亚信科技共同创始人、美国IPDynamics公司首席技术官张云飞、创锐视讯(香港)技术总裁叶晖等。

与此同时,中国科大先研院还特别重视研究生培养,以期为先研院技术创新与产业培育储备优秀人才。“研究生培养采用‘双导师’制、创业辅导员制,通过校企合作,形成‘特色培养+专业导师+创业辅导’的人才培养模式。”陆守香说,创业辅导员制是先研院研究生培养中的一个创新举措,其目的在于将入驻企业的研发力量引入研究生培养中,使得学生能在先研院各类研发平台上得到实践教育环节的训练和熏陶。

目前,先研院首批400多名工程类研究生已经入驻园区,今年9月份还将招收第二批670名研究生。